

越改官越多是关门搞改革的“成果”

改革是项复杂的工程,一个部门关上门闷头搞并非最好的选择,要让良好意愿变成现实需要多个层面的全面改革,尤其离不开“顶层设计”。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河南省警务机制改革2010年11月6日开始实施,当时郑州市10个公安分局全部撤销,114个派出所被整合成29个“大派出所”。4年之后,当初的“大派出所”在“派出所”的牌子边上,又挂上了“公安分局”的牌子。(本报今日A16版)

“加牌子”之举,已经明显透露出郑州警务改革的窘境。当时启动这项改革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警力下沉,充实基层派出所,加大街面力

量,但是实际执行下来,效果并不理想,只能进行修正。对此舆论表示理解的少,表达谴责的多,毕竟改革一场又兜兜转转回到从前。群众更不满的是,因公安分局数量翻番,现在领导数量已经增加近百人。这种局面难免让人生出“改来改去,群众没有好处,官员却得了实惠”的叹息。

其实,放在全国层面上,在一些基层机构的改革实践中,类似“改不下去”“机构越精简人越多”的情景并不少见,不过郑州警务改革表现得更为典型、更戏剧化,也更体现了自我改革之难。这项改革之所以失利,原因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但起码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启动之前有没有做过试点和探索,有没有冒进的因素?从现有信息可知,2010年6月,新乡在河南率先推行“撤销分局,警力向派出所一线倾斜”的警务改革,当年11月,郑州的改革启动。而实际上,各警种如何融合、协调,“大派出所”如何与检察院、法院对接,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其二,改革过程是不是封闭的,有没有引进民意参与、民意监督的因素?在这项改革刚一公布,即有人指出,这项改革是以“成品”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对改革内情外界知之甚少,这会严重影响改革的公正性和效果。其三,部门内部自我动手,因为涉及机构及人事制度等方

面,免不了要触动既得利益,要真动刀子并不容易。而且,还涉及到和其他部门衔接、配合的问题,自己改了别人没动,接不上轨,难免掣肘。

对于自发的改革,有必要保护其热情,不能因出现波折就横加否定。不过,地方政府和部门也必须正视单兵突进的难度和关门搞改革的局限。毕竟,如果改革效果与原来设定的方向相背离,甚至一蟹不如一蟹,那不但会劳民伤财,还可能让群众对改革动机产生怀疑。改革是项复杂的工程,一个部门关上门闷头搞并非最好的选择,要让良好意愿变成现实需要多个层面的全面改革,尤其离不开“顶层设计”。

中国富人还没到和盖茨比的时候

□金岭

前几天,比尔·盖茨说,中国的富人还没有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他呼吁中国的富人多做慈善,并认为中国缺乏系统性慈善行为。盖茨的几句话照例又成为我们的一些媒体对中国富人进行道德讨伐的利器。

这里讨论的中国富人,是指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合法致富的人,而不是靠非法手段或权力寻租聚敛财富的人,这一点必须首先说清楚,否则,就失去了讨论的前提。中国富豪们的那点小积累,根本就不好意思在人家盖茨面前得瑟,所以无论比财富还是比慈善,当然都会被比下去,根本不用咱自己的媒体再费唇舌。一些媒体的比较结果,当然都是中国富人“为富不仁”,好像中国富人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是“厚黑学”的污水给灌大的,这么个比方,是越比越丧气,越比越来气儿。以盖茨为标准对中国富裕阶层进行道德烧烤,公平吗,有这么简单吗?

事实上,中国富人和盖茨有诸多不可能比的地方,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盖茨生活在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处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其创造和吸纳财富的能力与效率,绝大多数中国富豪根本没法比。因为我们还处在工业化中期,中国的富人们大多还处在创业、扩张的阶段,多数民营企业还都面临

就势论事

我相信,中国富裕阶层的道德水平,直接反映着中国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既不比一般大众高,也不比一般大众低;对某个特定阶层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可能会撕裂我们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情感,因此,任何一个有能力参与公共讨论的人都应当慎重出手。

着转型升级的重重关口,甚至连现代企业制度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让他们和盖茨比慈善捐款,这大不对称了。二是发展环境差异很大。盖茨见过“行政审批万里长征图”吗,如果我们还不能为创业者提供大致相当的发展环境,就不必着急拿中国富人和盖茨比慈善;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国情,对于当下中国富人来说,慈善当然要做起来,但提高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吸纳更多就业,创造更多税收,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这和慈善一样重要。再说了,美国的慈善,除了宗教文化等影响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个制度激励问题,正如盖茨所建议的那样,中国政府应考虑

对慈善采取政策鼓励,例如减免税收——我相信,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下,盖茨能做到的,中国的富人也能做到,这一点不必自卑,至少媒体没必要先自卑起来。

把初级阶段的中国和后工业化社会的美国比,反映的恰恰是一种虚妄的态度。在媒体上批判别人的时候首先要自问,在同样的条件下,假如你是富人,是否能做得更好——如果不敢或不愿这样自问,那枪口对外的道德批判就没有多少价值。我相信,中国富裕阶层的道德水平,直接反映着中国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既不比一般大众高,也不比一般大众低;对某个特定阶层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可能会撕裂我们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情感,因此,任何一个有能力参与公共讨论的人都应当慎重出手。当然,那种靠非法手段和权力寻租变身富豪的人,哪怕他们把财富都捐出来,也一样抹不掉灰暗的底色,也一样要面对道德审判。

这样说,并不是中国的富裕阶层没有缺点,正如盖茨所说,中国富人购买了很多西方富翁品味的东西:艺术品,湾流私人飞机、DRC葡萄酒和爱玛仕手袋。确实如此,中国富裕阶层的公益心应该尽快成长,因为在任何社会,财富阶层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对社会风尚的引领和带动能力,都远远超过普通劳动阶层,这一点不容回避,也是先富起来的人早晚都得面对的问题。

舆论场

警惕“坏的市场化”

国家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9日联合发文,提出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这一被比喻成“松绑”的措施引发热议。

放开价格管控,引入社会资本,意味着医疗领域行政干预减少。新华社评论从资源配置角度着眼,认为此举利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全社会力量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政府可腾出更多资源投入基本医疗服务,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平。

不过,增加供给是一方面,解决“以药养医”下的“看病贵”更为现实。《新京报》就分析称,形成“以药养医”的关键是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无法通过正当的市场规律获得反馈,允许非公立医院首先放开价格,将逐步理顺我国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

相比上述的肯定观点,《东方早报》却对此泼了一盆“提神”的冷水。该报评论员沈彬撰文称,现实中医疗行业里行政壁垒森严,行政积弊不除,公立医院可依托公权力搞不正当竞争,所谓的医疗“市场化”注定是“坏的市场化”。因此,医改关键在于营造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的环境。

话说回来,给民办医院价格“松绑”到底成效如何,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普通群众。诚如政府和民资合办的浙江萧山医院院长商炜炜所说,“病人会用脚投票。”(姜士强 整理)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 (0531) 86993336 86991208

读者服务中心 96706

报纸发行 (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 (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 (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jwb 腾讯官方微博 e.qq.com/qjwb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服务山东百姓健康

齐鲁名医下基层 大型公益巡诊(聊城站)

主办: 山东省卫生厅 齐鲁传媒集团 **承办:** 齐鲁晚报

时间: 2014年4月12日(周六上午9:30) **地点:** 茌平县人民医院(茌平县文华路99号)

参与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山东省口腔医院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聊城市人民医院	茌平县人民医院	济南糖尿病医院
	济南哮喘病医院	济南中德骨科医院	淮海白癜风医院	济南青华不孕不育医院

义诊专业:	田永杰(妇科)	赵学军(疼痛科)	杨杰(儿内科)	单培彦(神经系统)
	周春文(泌尿外科)	高德宗(乳腺外科)	孙钦峰(牙周科)	刘峰(颌面外科)
	王斌(心理咨询)	寻广磊(精神科)	成爱华(白癜风专业)	谭洪栋(骨科)
	刘儒安(骨科)	高震(呼吸内科)	付利华(糖尿病专业)	张曼华(糖尿病专业)
	王高峰(眼科)	何天贻(不孕不育专业)		

名医名院助阵 家门口看专家 免挂号费、专家费、部分检查费! **咨询热线:** 0531-85196052 0635-8278128